

流动与嵌入:数字时代媒介人类学 对村落研究的实践与拓展

孙信茹

【摘要】在村落社会展开媒介技术与人的互动性研究,探究村落与文化的变迁,是媒介人类学研究者长期关切的核心议题之一。在网络社会与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村落社会面临着新的流动性加剧的问题。流动性既是今天村落社会的重要特征,还成为人们的日常实践与生活。流动性作为媒介人类学介入村落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具有不同层面的表达:首先,是时空上的流动形成新的村落社会关系;其次,是媒介技术促发的信息多元和网络中的流动,塑造出村落社会新的流动性景观和文化。对流动性的重新理解是对当下开展村落研究的一种拓展,但同时,这种流动又深嵌于村落社会情境和文化结构之中,需要研究者在具体的结构和关系系统对社会事实进行总体把握;须将流动和嵌入视为媒介人类学视野下村落研究的一种操作性路径,围绕和聚焦人的媒介实践活动展开探索,进而为乡村传播在数字化时代提供新的方向。

【关键词】流动;嵌入;媒介人类学;村落;发展

【作者简介】孙信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江苏 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新闻界》(成都),2024.4.16~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在地化与社会发展研究”(21BXW035)。

一、村落变迁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在流动社会背景下,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的渗透进一步加深,中国社会迎来新的传播场景。媒介技术开创的新生活方式和多样化互动手段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结构与日常用语,不断影响“人们通常对话着和所处社会关系的感知”^[1]。数字技术与网络社会的崛起,对于居住在特定社区的人来说,过去意味着安全、稳定、熟悉的村落愈发被卷入流动、变化和观念、信息的冲突之中,呈现出巨大的变化。第一,村落开始出现双重流动性的交织格局,这首先表现在村民通过外出谋生、劳务输出和异地搬迁等方式实现物理空间的迁徙,其次是网络空间的生活成为常态。乡村社会生活呈现出不仅人在跑,数据也

在跑的景象,而村落的互动方式既“包括与‘在场’的人的互动,也包括‘想象在场’的互动”^[2]。第二,村落中出现新的生存经验和社会关系的联结。这具体表现在村民们依凭多元化和网络化的生存空间,不仅谋生方式日益增多,而且凭借新的交通工具和网络技术,活动范围和生活体验也不断扩大和丰富化,人们开始在社交媒介上展开交往活动,新的社会关系联结成为可能。第三,社交媒介成为另一种生活技术,创造出新的文化景观。村民开始具备“网络个人主义的新诠释”^[3]能力,在短视频等新型媒介技术的影响下,村落成为“自我现代化发展期待的可视化空间”^[4]。

面对这些多元变化和复杂格局的出现,在以村

落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乡村传播研究中,需要关注这类研究得以展开的场景与空间已同昔日的村落有着边界上的突破和意涵上的变化,新的流动性背景和数字化技术成为不可避免的重要力量和影响因素。因此,村落所处的历史语境、介入的新力量和新要素对重新认知和阐释村落具有什么影响,当前社会格局下如何开展村落研究,对乡村发展乃至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村落研究带来的启示意义是什么,就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就将村落作为单位展开社区研究,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汉学人类学家葛学溥对广东“凤凰村”的研究^[5]。派克在访华期间有感于“中国进行研究最合适的单位是农村”^[6],这一点与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的思想不谋而合。众多学者“约在一九三三年至三四年开始运用功能学派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调查,探索经验”^[7]。费孝通也指明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单位是村落”^[8]。早期的研究者们将社区界定为具体的村落,因此,中国的村落便具有了独立文化单位和社会单位的性质^[9]。在此基础上,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等学者先后发表了以单个中国村落资料为基础的社区研究著作^①。在这些研究过程中,中国学者逐渐形成了对社区的理解。

当然,学界对社区的理解也不断处于变化之中。“自20世纪中叶以来,对村落社会的调查出现了两种新的研究取向:一种是关注‘村落社会’之上的集镇(或者说乡镇),另一种是进行多村落的调查。”^[10]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对中国村落社区研究进行反思。有学者认为对一个村庄或社区进行观察,尽管能够获得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但“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而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11]。黄宗智企图超越费孝通的村庄范式 and 施坚

雅的基层市场范式,他以乡村经济关系为核心考察乡村结构与社会关系^[12],尝试“探索一个范围更大的地域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13]。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可以看到虽然社区仍是村落研究的基本单元,但研究者在努力突破个体村落,不再倾向于将村落视为隔离于外部世界和社会的“封闭群域”^[14],而是更努力地去探寻村落与村落、村落与社会、国家之间的流动与连接,去更多地关注全球化角度下乡村变迁“面对着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乡村’”^[15]。

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村落的流动性加剧使得社区的封闭性愈加减弱,“能够被看作是整体社会的具体而微的社区在消失”^[16]。与此同时,传统的村落社区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17]甚至“无主体熟人社会”^[18]转变,传统的村落边界变得模糊,甚而不复存在。这一时期“村落的终结”里的羊城村^[19]、“跨越边界的社区”的浙江村^[20]等研究都在此背景下诞生。不过,尽管研究者开始引入流动性的视角观察村落的变迁,但是,一定程度上“所折射出的定居主义思维过于强调地域边界的辖域化”^[21]的意识还有所凸显。而且,如有学者提出的那样,“共同体取向的村落研究在关注地方社会系统自治和整合能力的同时,降低了对流动性和乡村类型分化的理解,这突出地表现为以单一个案散点式地呈现变动的乡村性成为村落转型研究的主要方法”^[22]。同时,这种以村落作为研究单位的取向还会使村民的行动淹没于整体的结构性变迁之中,由此带来看不见“人”的村落研究结论^[23]。

与社会学、人类学中对村落流动性讨论不同的是,传播学者提出,在媒介化社会语境下对处于社会结构变动,经济、文化和生活剧烈变迁过程中的群体或个体展开研究时,应将“媒介及其传播活动纳入考量的范畴”^[24]。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从对传统村落社区的观察开始,就应将电影、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

纳入对社区的影响分析之中。但早期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出发,重点调研和掌握乡村社会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媒介的普及和发展状况,从而追寻技术与社会发展、人的观念变迁之间的关系。比如,方晓红对苏南农村传播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25],李艳红《中国乡村传播学》^[26],等等。伴随媒介技术的更迭,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社会进一步深度媒介化,研究者开始转向探究媒介及传播对个体和日常生活带来的诸多影响,进而考察媒介实践如何成为一种常态。由此,我们提出了村落研究中的媒介人类学方向,着力对媒介技术进入村落的过程性进行描述和呈现,关注具体的人围绕媒介技术所展开的实践,“从而探究媒介如何嵌入不同社会与文化生活”^[27]。这实则也是对上述转变过程的一种回应。

在这样的媒介变迁过程和历史语境中,对于传统村落来说,“流动性”不仅是一种社会变迁的表现和影响力量,也是人们具体可感的实践与生活方式。同时,更是人们在媒介世界和现实世界中转换重叠的过程。在众多关于流动性的表述中,传播与技术带来的流动性视角如何提供给我们重新去审视村落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技术与村落及社区之间是否产生新的关系?若将这种研究放置在媒介人类学的视野和研究范围内,那么自然就会追问这样的问题:媒介人类学视角下的村落是什么?以互联网和新媒介为代表的流动性媒介技术在哪些层面、以何种方式对有着相对固定边界的村落产生新的影响?本文尝试以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历程作为经验对象,来理解数字化背景与媒介人类学视角下村落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二、媒介人类学视野下的村落研究

(一)作为田野研究单位的村落

在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界,村落作为田野研究

重要而基本的单位,一直以来都被学者所重视,由此产生大量对村落概念的分析。早期学者较多从社区的角度进行阐释,吴文藻认为社会“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28]。费孝通指出,社区可大可小,“只要其中的人都由社会关系结合起来,都是一个社区”^[29]。由此可以看出,社区是具体生活着的人们所拥有的共同时空坐标。这些表述中,其内核与有着固定边界、范围较小、研究对象人数有限的村落基本一致。从技术性操作的角度来看,村落也被认为是社区研究较为便利的单位。大量村落研究的成果,如凤凰村(葛学溥)、台头村(杨懋春)、江村(费孝通)、义序(林耀华)、鹭江村(杨庆堃)、长弓村(威廉·韩丁)等,都是早年村落研究的经典。

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村落的调查研究一度沉寂下来^[30],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村落研究热潮才再次出现。黄树民的林村、王铭铭的溪村、阎云翔的下岬村、折晓叶的万丰村、于建嵘的岳村、吴毅的双村等,都是学界公认的研究代表。这些研究既聚焦微型社区,又力图做全景式的民族志展示,研究者要回答“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本质”这样的“大问题”^[31]。村落的概念和研究优势也进一步得到学者的阐释,例如,李培林在总结村落社区研究的优势中提到,村落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末梢;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通过私人关系易于融入^[32]。在这个过程中,村落不仅被看作是田野研究的基本单位,对村落基本特征和相关性的把握也逐渐成为研究者重视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边界性、跨越性和整体性三个层面和特点上。

从边界性来看,村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共同体,具有明显的可被识别的边界。李培林提出这种边界包含了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33];折晓叶从村庄与外界的疆域性界线来使用村庄边界的概念,但同时也提出边

界是具有多元性的^[34]。因此,村落隐含着居于共同生活空间、相近价值信念的共同体的意涵。村落研究也就意味着是对“微型社区”展开的研究,“这样的村落研究无形中在村落内外建构了一个‘边界’”^[35]。而跨越性的特点早在费孝通、雷德菲尔德的论述中就已出现。他们认为“视乡土社会为封闭与自给自足的社会或者将视野仅仅局限在乡土社会上对认识整体社会都是不完整的”^[36]。费孝通强调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基层结构的多元性,提出“不仅需要关注横向的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结合的原则(‘差序格局’),也需要探讨纵向的立体关系结构(‘城乡关系’)”^[37]。雷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暗含不要把人当作一个孤立去研究之意^[38]。王铭铭也提出村庄的地方性和社会的超越性问题^[39]。从整体性来看,这其中既有对村庄结构的理解,也有对研究方法的阐释,指出了村庄调查须关注文化和社会的整体性,用整体主义的视角去理解村落。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研究中,看到村民与村落外社会之间存在的交换关系,发现通过集镇这一重要节点,“基于江南地区特有的水上交通,村落与村落之外更广阔的社会连接在一起”^[40]。因此,对乡土社会的理解不能只局限在村落内部,而应该将其与更广阔的社会体系勾连才能实现对中国的整体把握。

村落和小型社区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得以具体展开的场景,便于我们进入特定的社会事实内部和社会结构中去观察,也使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群体和社会关系的分析较为容易展开。这一村落观察的传统也影响到了围绕媒介展开实践活动的田野研究,尤其是对长期驻扎在村落研究的媒介人类学者来说,更是较为自觉地将村落作为调研的重要空间与对象。从这个角度讲,以一个具体可触及的村落作为研究空间和场所,在媒介人类学领域尤其是

其早期发展阶段中仍旧占据了主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经典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回应与秉持。

(二)媒介人类学研究如何进入村落社会

受到人类学整体主义的影响,从媒介人类学的视角切入村落研究,意味着须将社会现象放置于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网络中去考察,并进行深入和长期的观察,这样一来,深入村庄本身的运作和关切村庄结构就构成了研究的主轴。要准备描绘出一类群体或某种现象,只有将其意义蕴含于文化整体性的深刻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在研究印第安人手鼓时,提出不能只将手鼓看成一种发出声音的工具,它还是一种产生驱邪声响的文化用品^[41]。此种观察视角自民族志的基本范式确立之初就开始形成,它“意味着我们要把文化想象成一张大网,结构、符号、信仰、规律和法则,都在其间相互作用”^[42]。哪怕我们研究的是某个切片或专题性问题,整体论的定位也必须“促使田野作业者的观察要超越一个暂时的文化图景或文化事件”^[43]。

回顾我们对村落的田野观察,在早期我们就提出,进入村落进行媒介人类学的观察首先需要关注村落的“日常语态”,这里的日常语态其实就是要求研究者对村落进行整体主义的把握。它包含了三个层次:空间上的日常语态、时间上的日常语态及文化象征意义上的日常语态^[44]。关注空间层面的日常语态,在于勾勒村落内部社会、经济、文化等结构;关注时间上的日常语态,重点在于分析村落的社会历史发展;而文化象征意义上的日常语态,则涉及村落和民族的精神内核与文化表征。这一时期我们的关注点在于突出媒介在场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具体以云南四个少数民族村寨(元阳县箐口哈尼族村、兰坪县大羊普米族村、大理州石龙白族村、瑞丽市大等喊傣族村)展开持续的田野观察,获得了一些初步的

研究成果。在大等喊傣族村,我们将家庭照片视作一种重要媒介,它承载个体、村落、社会等不同层面的记忆,同时还能有助于人们标出自我认知与实现身份认同,探究照片所展现出来的人们共同记忆和文化,分析村落社会机制、文化信仰和媒介技术之间的关联成为可能^[45]。在大理石龙白族村里,我们发现大众传媒成为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语境,会对传统文化事项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产生作用。在持续研究时间最长的大羊普米族村,我们以村民的传播实践和赋权研究为线索,结合村落文化逻辑理解村民主体性,进而寻找乡土社会自有的发展脉络^[46]。

在上述研究中,我们尤其重视媒介和传播对村落社会不同层面群体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将这种影响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大众传媒对个体发挥的影响,例如对个体生活、交往、消费、观念意识等方面的作用。二是,大众媒介对村落社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媒介如何介入家族和群体生活,怎样作用和形塑公共空间等方面。可以看到,传媒加剧村落变化的程度和速度,但也带来新的文化表达和村落生活方式。以上两个层面的研究虽然看到外部力量如媒介、讯息流通对村落带来的影响,但基本还是将村落看作一个独立的空间和运作的系统来看待。据此,我们提出第三个层次,即村落研究还需突破村落空间的限制,充分意识到村落的微小变化并非在真空中发生,而是紧紧与更为宏大的国家背景及外部空间相连,共同体社会的发展与国家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要将村落裹挟进去,研究者必须对此充分重视。

自互联网技术进入传统村落社区后,我们展开了媒介人类学与村落社区研究的第二阶段,即社交媒介与村落日常生活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基于大羊普米族村与大理石龙白族村展开。在大羊村,我们发现自新媒体进入村落,作为技术使用主

体的村民具有了更为积极的行动与实践能力,多元和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不断被催生,这在微信等社交媒介的使用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研究发现,借助微信等社交媒介,普通村民熟稔地游走于线上线下的双重空间,既可以实现多重身份的自由表达,同时也将乡村与外界社会更紧密地关联起来^[47]。这些创造性的技术使用在那些流动性更强的村民身上体现尤盛,由此我们注意到人、地点与数码技术的关系,具体分析了村民在社交媒介中标注地点的方式,正是城乡转型的背景和流动的频繁化让今天的村民拥有了和固着土地的祖辈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地点与数码技术的结合恰是这种状态最好的表达。因此,刻意去凸显与呈现网络地点的行为,让我们看到流动的背后是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些屡次出现的网络化地点,是村民将技术与遥远的族群记忆、传统生活方式的想象以及当下流动生活的印记联结起来的重要表达方式^[48]。在大理石龙白族村,我们对村民的微信群产生了兴趣,通过对白族微信山歌群中对歌行为的考察,展现了白族民间艺术所经历的媒介化过程。微信对歌不仅创新人们的交往方式和增添生活意义,同时,人们还运用微信打造了新的生活世界,继而形成个体新的规范和文化实践^[49]。考察白族社区微信群时,我们提出嵌入乡土的“微信社区”,在这种生活实践里形成的微信社区,将村民置于一种数字技术的新秩序之中,让村落社会既在一定程度上脱域,同时又时刻不弃乡土文化。这样的研究,让我们看到新技术和网络逐步进入村民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的过程,传统村落也有机会形成线上新型社区^[50]。

我们开始意识到,尽管媒介人类学研究者将村落作为一个具体的田野所在地展开研究,但却并不意味着和过去传统社会学、人类学学者所持的观察视角是相同的。尤其是互联网和新兴数字技术带来

更多流动的的日常性和多元类型之后,村落变化的方式、人员流动的规模和速度等都与以往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村落内外的关系与转换也和过去不同。在网络技术和信息流动日益深入的影响之下,社会开始呈现出一幅“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51]的现实图景。由此,媒介人类学研究者需要对网络技术所开创的流动性给予新的理解,较为自觉地将流动不仅理解为地理空间的迁徙和变动,更将流动看作是数字世界与网络空间的状态和一种带来影响的结构力量。事实上,我们在微信社区研究中,就看到这种深刻的变化,即传统村落经由社交媒介的影响得以形成的新的流动性网络社区,这在过去传统的社区研究中是不曾有过的现象。与此同时,来自田野的观察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当人们一方面运用数字技术创造新的文化方式并形成不同以往的在线生存时,乡土社会的文化逻辑和社会结构似乎还在发挥作用。如何解释技术实践与社会整体性之间复杂的扭结关系?换言之,行动主体的媒介实践是将其行为嵌入村落中的过程。正是在这点上,我们围绕新媒体和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探索,开始在“流动”的基础上提出“嵌入”的问题,并尝试将两者作为重新理解村落的视角。

三、流动与嵌入:媒介人类学中村落研究的拓展

(一)流动作为理解数字时代村落研究的理论视角

传播和媒介技术对村落社区的介入是媒介人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这种研究在互联网时代愈发凸显。技术变化带来研究内容的多样和丰富,拓展了传统乡村传播研究的范围,但是更值得研究者思考的不仅是研究内容和范畴的拓展,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是否能够引入新的研究视角。即,我们应该在观察村落社区时重视村落空间和边界的巨大突破,而这种突破最为显著的特征莫过于流动性的加剧。在

重新理解村落的理论潮流下,村落被逐渐看作是不断处于流动状态的空间所在。伴随着流动性社会的加剧,流动开始成为不断影响村落社会生活,甚至组织村落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费孝通的村落类型学、施坚雅的基层集市社区模式,黄宗智通过建构国家、士绅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将微观与宏观连接起来^[52]的研究都是这方面的努力。当然,这些学者在当时情境中所做的探索和今天的流动已非同样的意涵与层次。人类学家对村落“究竟是一个社区?还是一个共同体?村庄究竟是自足的?还是一个更大世界或网络中的一部分”^[53]等诸多反思,主要还是将村落理解为一个具体的“点(空间)”或“点的聚合”,去寻找村落空间和大的社会整体结构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在流动性成为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背景下,学界产生了对流动性的诸多论述,厄里对流动性的论述影响尤其较大,他在《超越社会的社会学》^[54]《全球复杂性》^[55]两本著作中集中讨论了作为社会理论的流动性问题,提出流动不仅包含人身体的移动,还包括物的物理移动、视觉媒体中想象的旅行、借助数字媒介的实时虚拟旅行和信息内容的通信旅行^[56]。尤其是新的流动范式提出,“还意在探讨社会关系是如何通过人、物体、信息和图像等跨越距离的交叉运动形成的”^[57]。流动范式也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中得到了回响。此外,彼得·阿迪将移动性看作是“一种通过分析与世界建立联系,参与和理解世界的方式”^[58],这里的移动性其实就是流动性。“流动性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流动对社会的建构使流动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它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再现,而是嵌入其中进而改变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以及产生的社会关系。”^[59]不难看到,社会学、人类学和人文地理等诸多学科已经意识到了必须要引入新的理论视角,突破传统的社会和区域研究。

媒介人类学对村落社会研究的深入和重新理解,其实也是自觉将新流动范式引入其中的实践,这种实践带来的意义和价值可能在于昔日作为特定空间的村落概念也在发生转变。乡村社会空间“不仅是每个个体的农民安身立命的场所,同时还是一个具有一定共同体特征的社群,具有很强的生活互助性和伦理共同性,是农民完成社会化,并定义自己生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主要场所”^[60],这样的表述其实已经可以看到村落社会中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吴小英在讨论流动性对家庭所带来的影响时的分析具有启发性:“家庭是由特定群体在他们的日常互动中建构的关于社会关系的含义。”^[61]与家庭类似,村落空间不只是物理性的所在,“更是人们群体特征和社会关系的体现”^[62]。从流动性的视角看待村落,今天的村落也是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但这种社会关系更加突出了多种流动性的组合,是跨越村落物理空间与距离的新的社会联结方式。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将流动性作为媒介人类学村落研究中的一种理论视角,就具有了不同层面的表达。

首先,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村落产生不同聚落空间的流动,尤其是物理和网络空间的双重流动性。事实上,如果追溯村落媒介和传播的历史,由技术引发的流动并非只是发生在互联网时代。例如,在大羊普米族村,从20世纪50年代末村民开始使用手摇电话,到之后的电报、流动电影放映、收音机、大锅盖电视,再到后来的手机、移动互联网等媒介,一步步地将村落与外界世界连接起来,逐步建构出一个基于媒介技术连接起来的信息交往网络。但相比较而言,传统媒介时代人们对技术所营建出来的时空似乎是一种“敬而远之”的观望和被动接收,而数字化技术时代则表现为人们主动积极地拥抱并融入新的网络时空中。

其次,新的流动性形成村落社会关系的流动。这具体表现在近些年来乡村社会中大量村民的外出务工、移民搬迁等流动性上。以我们调查的云南少数民族村落来看,村民外出参加工作、学习、谋生、搬迁等活动,已经成为很多村民的日常。以云南怒江兰坪县为例,2000年以后,为响应县里的统一安排,很多乡镇组织了大批农村青壮年到深圳、珠海等地打工。在我们所研究的大羊村里,村民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集体外出务工,大羊村大范围外出的流动由此拉开了序幕。流动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不仅是距离的迁徙,更意味着一系列复杂的变化,由人口的流动带来了经济、交往方式、文化观念的变化,甚至也引发了婚丧嫁娶等传统仪式性活动的改变。我们看到这样的现实场景:一个土生土长的普米族年轻人在微信中通过标记地点,刻画了自己在超越村落空间之外多个地方游走的数字足迹,他用身体和网络中的移动,履行一种跨界及打破固有经验壁垒的行动^[63]。我们也不难理解,在村落传统的婚礼仪式中,有过流动或正处于流动过程中的年轻人总是愿意尝试在民族婚礼过程中加上很多西式和现代的细节,这包括对服装(从民族盛装到西装、婚纱)、拍照等环节的运用和调适。这些新的现象,牵引研究者对自我界定和社会关系连接、聚合等内容予以重视。

再次,媒介技术塑造出村落流动性景观和新型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村民被卷入到网络化过程后,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使用,在流媒体的空间中创造出村落社会新的文化景观,也催生出新的价值观念。传统媒介时代,这种对技术的运用多满足于信息的获取,更多地来自于国家力量自上而下的技术普及和推广。而数字化时代与传统媒介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景观不可同日而语。例如,在大理石龙白族村,我们对村庄里一群返乡创业的年轻司机群体组建的“石龙老司机”微信群做了研

究,考察了车辆和微信形成的双重流动空间,发现微信为80后、90后为主体的村落司机群体创造了一种流动的新乡村景观,他们在车辆和微信构筑的流动空间中建立起新的关系,进而开创了一种弹性生活的可能。而一些民间艺术的传承人凭借自己在社交媒体中累积起来的名望和资本,开始在微信的视频号中拍摄短视频,将乡村土特产转化为能够被大众轻而易举就能获得的特色产品,在销售产品的同时也将村落文化在互联网世界中进行着展示。网络技术影响下的村民将传统民族和民间艺术样式进行了“再生产”,例如,白族人将传统的白族调搬到微信中,以网络化和技术化的手段对“唱山歌”进行重现和创造。这种微信对歌,是对社交媒体技术的创造性使用,关系到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和知识传承,也不仅仅是传承人的存续和发展,更关键的是该技艺所生产的物品、情感和关系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被使用、欣赏和赋予价值”^[64]。

(二)以嵌入的方式进入村落社会事实的内部

流动性的视角提醒我们,社会结构中的不同部分越来越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没有哪个研究对象可以静态、孤立地进行观察。媒介人类学研究者的使命需要在纷繁复杂和多图景交织的局面中,窥见技术与特定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并有效追溯技术嵌入社会体系的过程。从这样的基点出发,在关注村落流动性的同时,还必须把这种流动和村落社会特定的文化及社会关系、结构关联在一起考虑,这样,作为一种关系性视角的“嵌入”势必成为村落研究中不能忽视的维度。嵌入是一种以探求关联性为主的研究方式,其目的在于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围绕媒介展开的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活动^[65]。这样的思路提醒研究者,在对村落流动性观察和理解的同时,不能忽略人的流动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结构和基础之中的。

事实上,嵌入的概念作为波兰尼思想的逻辑起点,表达了一种理念,即“经济并非像在经济理论中那样是自主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66]。此后,格兰诺维特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具体联系出发,提出经济行为是被嵌入社会关系系统中的观点,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不规则地、不同程度地渗透在经济生活的不同部分”^[67]。波兰尼的阐释始于经济与社会现象的关系,但其对事物间联系性与制衡性的分析极具启发意义。尤其是20世纪末以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连通性与边界的流动成为日常,社会复杂性日益加剧,嵌入概念得到了大大地拓展,从原先从属于经济社会学领域的理论概念逐渐泛化为对社会复杂性的描述,“具有了渗透、植入、嵌套等含义,其意义也变得多样且更有普遍性”^[68]。

嵌入这一极具启发性的视角,既要對村落社区“总体社会事实”的把握,也要求对社区个体即技术使用者生命历程和日常生活的追溯,因此,嵌入的视角亦是研究者完成见人、见社会的过程。从操作角度讲,研究者可将嵌入作为一种理论要求,自觉地以自身为工具,深入具象的生活情境,仔细观察和辨析研究对象的媒介技术使用实践,努力体会他者立场,真实可感地去理解媒介技术与人、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进入被研究者的“社会结构中的各种角色,参与当地人的生活,才能体会他们的生活内容”^[69]。也能理解“每个社区的这种长期存在且起十分重要的人际关系网络与任何其他一个社区的这种人际关系网络都是有区别的”^[70]。同时,“个人对媒介的运用,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心理状况、使用习惯等相关要素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识别这些要素,不是将其视为孤立的现象分辨,而是应当找到框架,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研究”^[71]。要完成对社区系统的把握,不仅需要嵌入研究对象个

体层面,还须嵌入社区的整体情境,即把握总体的社会事实。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村落中社交媒介的使用主体并不是那些一直停留在原地的人,而是处于流动和多元社会关系中的人。也就是说,对不同的个体和群体而言,媒介被理解和运用所产生的土壤大相径庭,把握人与媒介技术的真实互动,“需要把人们围绕媒介展开的活动与生成的复杂关系嵌入历史的脉络和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中考察,从而达到对人类整体性和多样性存在方式的理解”^[72]。例如,当白族村民在微信中复兴传统的民族歌舞时,他们也将本社会群体传统的性别、代际交往准则和文化规约放到新技术的使用过程中。村民在对新兴技术进行创造性使用的同时,乡村社会的惯有伦理规范和道德信念仍然发挥强大的作用。可以说,流动空间深嵌于社会和文化情境,与地方空间及共同体仍旧交织重叠。

此外,新流动范式的引入,也为我们看待嵌入提供着新的理解。尤其是新流动范式不仅关注流动本身,还注意到了“不动性”的系统。例如,从空间流动来说,车站、机场、公路为流动提供着基础设施和必要条件,数字技术也为信息、图像、新文化景观的流通提供支撑。可以看到,流动的发生恰恰是建立在诸多不动的技术和平台基础之上的。村落社会仿佛就是那个不动性的系统,提醒着我们在聚焦村落流动性的同时,还要注意那些与流动系统彼此支撑和适应的不动系统。这样的思路在人类学家英戈尔德那里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回响,他提出的“栖居视角”,强调在生活世界中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73],人可以回到自然环境中与他者建立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其表达的意涵也与嵌入有着诸多相似。在这个层面讲,嵌入具有了和流动同等重要的表达与意义。

四、价值与阐释

(一)媒介人类学为村落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野

21世纪以来,农村人口流动大幅增多,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社会步入了媒介化。媒介化将社会关系从现有语境中剥离,并重新嵌入到新的社会语境之中^[74]。这一变化提醒我们,传播媒介及其活动是考量个体生活变迁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当我们致力于探究村落社会日常生活、风俗传统变迁乃至整个社会结构转变,同时努力寻求乡村发展新的道路之时,媒介和技术则成为当下村落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视角,这亦推动传统的乡村传播研究实现改变和突破。由此,当下的村落社区研究无可避免地须重视媒介技术的观察维度,这也为媒介人类学进行村落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与可能。当然,这里的媒介技术也并非只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大众媒介或媒体机构。我们所熟知的戴维·莫利在对传播概念和媒介内涵丰富的过程中提到,传播“不仅包括象征符号领域,也包括交通领域的研究,其范围不仅包括信息传播的工具,还包括当时的物质运输基础设施。还应包含交通运输及其基础设施”^[75]。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讨论,更是将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看作一种社会存在,构成并形塑着人们的栖居环境^[76]。如果说,媒介以不同形式“在发挥中介作用,使自身成为媒介的同时,也在规定着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特定秩序,通过生成时空、场景与实践,制造感知、经验与权力关系,持续地建构着社会”^[77]。

沿着上述脉络,媒介人类学为村落研究带来的新视角,恰是看到媒介在从原来更多承载内容的、具体的媒介物转变为“人类根本关系层面,被认为能够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宏观生活环境”^[78]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巨大潜力。这种视角,是一种并不同于过去社会学、人类学立足村落社会,且又超越村落边

界展开的研究和思考。可以这样理解,当年李培林针对珠江三角洲农村城市化的过程认为一些城市面临“村落终结”的问题,其实是为了提醒人们须看到“超越村落社会研究的另一个新视角,这就是‘村落边界’和‘村落观念’,前者指的是村落的地理边界,后者指的是村民心目中的村落认同观念”^[79]。媒介人类学的视野对村落带来的影响也有相似的作用。当然,这种相似性并非在于说媒介和传播带来人们观念和意识的改变,而是可以引导人们重新去定义和理解媒介在村落中的“出场”,同时提醒我们关注媒介技术如何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环境乃至生活结构。

(二)流动和嵌入为村落研究提供新的操作性路径和方法

在村落社会开展媒介人类学研究,我们提出的流动性特指一种伴随技术使用而展开的实践过程,这样一来,流动性就包含了人、物质、信息、交通,乃至社交媒介打造的空间的流动。在这种流动性的影响之下,对村落的把握和理解,除了认识其承载特定地方经验和人的生命根基之外,在村落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与网络互动,也成为当下村落研究需要重视的部分。从这个角度讲,媒介技术流动性视角的引入,为理解当前乡村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操作路径。如果说,媒介人类学对村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村落本身的空间展开田野观察,所采用的也常常是民族志的方式,那么传统的民族志的做法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民族志的谬误”,即“民族志往往像是患了近视,对近距离的行为能做出清晰的描绘,却视而不见产生和维持这些行为的那些不太明显的结构和过程”^[80]。这就是“民族志谬误”。“田野工作者试图避免民族志谬误的另一种常见方法是在单独的章节里讨论政治和经济力量,却不提供这些力量与他们在书里其他地方所写的生活

和行为之间的联系的证据。”^[81]媒介人类学主要以田野考察与民族志的方式进入村落,关注村落生活的细枝末节,嵌入视角不断提醒研究者需要注意结构和相关构成要素的影响,而且更关键的是,不把这种所谓结构当作摆设,而是在变化和生活的流程中呈现这些结构性力量的影响。

由此,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以流动性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具体去把握和追溯人们围绕技术展开的流动过程时,我们又得关注技术和行动者所建构起来的独特的行动空间。这就提醒研究者,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的,其应用的过程必将受到社会结构的建构。与此同时,“我们也拒绝在过渡整合的视角下将信息技术的使用群体看作是没有具体面目和区别的整体,更反对描述没有主体的变迁图像,而将研究对象定位成技术的被动接受者,看不到他们努力在技术产品和社会结构之间建构出的行动空间”^[82]。这样的思路进一步提示,媒介技术对乡村社会的拓展,是深嵌于乡村社会情境和文化结构中发挥作用和影响的,研究者应该要看到生活于其间的人的主体和能动性。“村落转型不仅包括物理形态、空间、组织、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结构转型,也离不开‘人’(村民)的转型。当前的中国乡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多元、复杂和开放,村民与村落的关系构成了乡村性变迁的中轴。”^[83]因此,流动和嵌入的提出,不仅关注作为空间和区域的村落本身的变化,更关注到了处于流动变迁过程中的村民主体,即村民本身的变化。

将流动和嵌入视为媒介人类学视野下村落研究的一种操作性路径,是一种主动将相关性与连接性纳入当下村落社会并对新的复杂现象进行描述的思路。在乡村的媒介人类学研究中建立流动性视野和嵌入性思路,提醒研究者需要将传统意义上对地域和边界的考量转向对网络和关系的思索,而这种网

络与关系同时是聚焦和围绕“人”展开的研究。生活于斯的“人”才是村落研究的主体,他们的实践活动才是促使村落发生变迁的重要因素。回到村落本身,也是回到对生活在此处的人的网络和关系变化的考察。

当下乡村传播研究面临新的拓展与变化,与以往更多关注媒介技术在乡村社会的普及与运用相比,流动性的社会背景下,乡村传播一方面要注意媒介如何成为一种新的村落特定秩序和基础设施从而建构乡村社会;另一方面,需要注意人们生成的实践和不同的流动类型,分析流动建构起了何种新的社会关系,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如何影响村民的身份认同、权力博弈以及人们在村落中的社会参与等问题。同时,重视多种流动的交织,不仅探讨实际发生的流动,还要拓展到那些“潜在的流动、被阻的流动、被规训的流动”^[84]。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人类学研究领域对于流动和嵌入的重申,提出了在流动社会和数字技术秩序背景下村落研究的一种新的观察路径。尽管来自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为我们累积了村落分析的丰硕成果,但对村落理解的视角仍影响着我们的理论视野,对村落本身的讨论也应该继续推进。也就是说,“村落在何种意义上被称为‘村落’:从实体主义视角(地域性的实体组织——外在可见形式)、结构主义视角(作为人际互动的社会关系网络)、文化主义视角(作为归属的意义建构)等不同视角出发,村落的命运亦会不同”^[85]。除了这些理论视角带来的理解差异,面向深度媒介化的社会与数字技术深刻影响的现实,更值得思考的是流动性和嵌入性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而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讲,媒介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拓展,围绕媒介技术变化及流动性社会的到来,用深入村落情境、追溯村落发展历程、经验性地把握村落变化的方式,从而也可能成为习近平

文化思想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要论断的一种具体和深化。村落的多视角和多方法研究,其目的也在于尊重乡土本色、乡土文化和传统,从而助力村落真正的发展。

注释:

①如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林耀华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等。

参考文献:

- [1]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修订版)[M].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8.
- [2][21][84]刘英,石雨晨.“回归”抑或“转向”?——国外流动性研究的兴起、发展与最新动向[J].国外社会科学,2021(2):122-132+161.
- [3][4]王心远.流动生活中的线上社区:中国新生代农村移民社交媒体使用的人类学研究[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8(44):151.
- [5]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M].周大明,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 [6]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M].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82-183.
- [7]李晓壮.中国社区研究谱系论[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2):59-74.
- [8]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5.
- [9]狄金华.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范式[J].中国农村观察,2009(6):80-91+97.
- [10][30][35][79]刘朝晖.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J].民族研究,2005(3):94-102+110.
- [11]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19.
- [1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

书局出版,1986.

[13]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徐自立,王嗣均,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9.

[14][39][69]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M].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1:101;40.

[15][22][23][83][85]文军,吴越菲.流失“村民”的村落:传统村落的转型及其乡村性反思——基于15个典型村落的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7,32(4):22-45+242-243.

[16][20]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27.

[17]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8]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9][32][33]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9.

[24]孙信茹,杨星星.流动的乡土:媒介化社会与少数民族村寨生活[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89.

[25]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6]谢咏才,李红艳.中国乡村传播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27][42][71]孙信茹.作为“文化方法”的媒介人类学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9(5):113-120+156.

[28]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40.

[29]费孝通.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代性的思考[M].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9:451.

[31][36][37][40]张江华.“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J].社会,2015,35(4):134-158.

[34]折晓叶.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J].中国社会科学,1996(3):66-78.

[38][70]雷德斐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M].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3.

[41]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经典导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8.

[43]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M].龚建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5.

[44]孙信茹,杨星星.媒介在场·媒介逻辑·媒介意义——民族传播研究的取向和进路[J].当代传播,2012(5):15-20.

[45]孙信茹,杨星星.家庭照片:作为文化建构的记忆——大等喊傣族村寨的媒介人类学解读[J].新闻大学,2012(3):42-51.

[46]孙信茹,杨星星.媒介化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村民传播实践与赋权——云南大羊普米族村的研究个案[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3):23-28.

[47]孙信茹.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3(10):6-24+126.

[48]孙信茹,王东林.作为记忆的地点——数码时代中社交媒体与地点互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5):66-84+127.

[49]孙信茹,王东林.微信对歌中的互动、交往与意义生成——对石龙村微信山歌群的田野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10):19-25.

[50]杨星星,唐悠悠,孙信茹.嵌入乡土的“微信社区”——基于一个白族村落的研究[J].新闻大学,2020(8):1-15+126.

[51]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54-389.

[52]邓大才.超越村庄的四种范式:方法论视角——以施坚雅、弗里德曼、黄宗智、杜赞奇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2010(2):130-136.

[53]杜靖.作为概念的村庄与村庄的概念——汉人村庄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11(2):91-102+110.

[54]John Urry.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M]. London: Routledge, 2000.

[55]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M].李冠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6]John Urry. Moving on the Mobility Turn[M]//Weert Canzler, Vincent Kaufmann & Sven Kesselring, eds. Tracing Mobilities: Towards a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Aldershot: Ashgate, 2008: 14.

[57][59]王鑫,崔思雨.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与传播物质性研究对社会学理论的接合与涵化[J].国际新闻界,2023,45(3):26-45.

[58]彼得·阿迪. 移动性[M]. 戴特奇,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2.

[60]董磊明. 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拓展[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0(5): 51-57.

[61]吴小英. 流动性: 一个理解家庭的新框架[J]. 探索与争鸣, 2017(7): 88-96.

[62]孙信茹. 大众传媒影响下的普米村寨社会空间变迁[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4(9): 158-162.

[63]王东林, 孙信茹, 张忠训. 位置媒介与数码地貌: 对一位普米族青年数字足迹的田野考察[J]. 新闻大学, 2023(9): 104-116+121.

[64]邱月. 成为多重技能的羌绣: 灾后重建地区的技艺实践[J]. 民族艺术, 2023(5): 142-151.

[65][67][68][72]孙信茹, 段虹. 再思“嵌入”: 媒介人类学的关系维度[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9): 103-111.

[66]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刘阳, 冯钢,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7.

[73]Tim Ingol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M]London: Routledge, 2000: 1-7.

[74]施蒂格·夏瓦. 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 刘君, 李鑫, 等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5.

[75]王鑫. 物质性与流动性: 对戴维·莫利传播研究议程扩展与范式转换的考察[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9): 159-176.

[76]束开荣. 互联网基础设施: 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的双重向度——以媒介物质性为视角的个案研究[J]. 新闻记者, 2021(2): 39-50.

[77][78]胡翼青, 谌知翼. 作为媒介性的生成性: 作为世界的媒介[J]. 新闻记者, 2022(10): 3-15.

[80][81]米切尔·邓奈尔. 人行道王国[M]. 马景超, 王一凡, 刘冉,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2019: 423.

[82]陈秋虹. 技术与社会的互构——以信息通讯技术在乡村社会的应用为例[J]. 青年研究, 2011(1): 11-22+94.

Moving and Embedding: Practice and Expansion of Village Research by Media Anthropology in the Digital Age

Sun Xinru

Abstract: It is one of the core issues of media anthropology researchers to carry out the interactive research between media technology and people in the village society and explore the village and cultural chan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and the digital technology, the village society is faced with the new problems of increasing mobility. Mobility is not only a new important feature of today's village society, but also has become the practice and life that people face in daily life. A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media anthropology intervention in village research, mobility has different expressions: first, the flow in time and space forms a new village social relationship; second, the information diversity and the flow in the network promoted by media technology, which shapes the new mobility landscape and culture of village society. The re-understanding of mobility is a kind of expansion of the current village research, but at the same time, this mobility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social situation and cultural structure of villages, which requires researchers to enter into the specific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system and have an overall grasp of the social facts. The flow and embedding are regarded as an operational path of villag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anthropology, exploring around and focusing on people's media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viding a new direction for r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Key words: moving; embedding; media anthropology; village; development